

浙江古代海外交流史的发展历程

龚缨晏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宁波大学浙东文化研究院

摘要：浙江是中国海洋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也是东亚海洋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更是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门户。纵观历史，浙江古代海外交流史的历程可以概括为：奠基于史前，发端于汉晋，跃升于盛唐，兴盛于宋元，剧变于明清，转型于近代。在中国海外交流史的巨大历史图景中，浙江就是这样从边缘逐渐发展为东亚海域的枢纽，进入16世纪之后又率先被纳入全球海上贸易网络中，并且以被动的方式消极而又艰难地应对着全球化浪潮的一次次冲击。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不仅以无比磅礴的气魄勇敢地直面新型全球化的猛烈挑战，而且还通过脚踏实地的拼搏，主动积极地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并且借助科技创新的巨大力量影响着全球化的进程。因此，只有改革开放才能使浙江不断繁荣富强，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腾飞。

关键词：浙江；海洋文化；对外交流；海上丝绸之路；全球化；改革开放

基金：浙江省文化工程重大项目“浙江海外交流史研究”（17WH20018ZD）阶段性成果；

浙江地处太平洋西岸，中国大陆海岸线中部，海岸线总长度及岛屿数量均居全国首位。浙江是中国海洋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也是东亚海洋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更是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门户。浙江古代海外交流史的内涵很广，包括涉外港口与海外航线、政府间的外交关系与政治交往、民间海外贸易与外贸管理体制、货物流通与人员往来、文化交流与科技传播等。纵观历史，1911年清朝灭亡之前的浙江古代海外交流史，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六个发展阶段。

一、奠基于史前

2013年，宁波余姚发现了距今8000多年前的井头山遗址，这是中国现今所知最早的贝丘遗址，它表明人们已经开始长期地、大量地、固定地利用海洋资源了。¹ 尽管井头山遗址尚未发现过独木舟，但却出土了一件“加工精细、保存完好”的完整木桨，² 这说明当时先民们一定能够建造独木舟之类的“早期水上航行器”（Early Watercraft，缩写为EW）了。³ 中国最早的独木舟，是在杭州萧山跨湖桥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年代约为距今7070±155年前，⁴ 这也是目前所知亚洲最早的独木舟。在随后的河姆渡文化（约距今7000—5300年）中，发现了更多的木桨。其中河姆渡遗址出土了8支，⁵ 慈湖遗址出土了2支，⁶ 田螺山遗址出土了6支。⁷ 此外，在河姆渡遗址还发现了两件陶舟模型。这些考古发现有力地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浙江已经出现原始的造船技术，而舟船的建造正是与海外进行交往的最基本的条件。

有学者认为，史前时代浙江与朝鲜半岛、⁸ 日本列岛就可能已经存在着某种形式的海上往来。⁹ 但就目前的国内外考古发现而言，这些观点尚无法得到确证。¹⁰ 不过，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太平洋西岸广泛流行的有段石锛（stepped adze），实际上起源于以河姆渡文化为代表的浙江沿海新石器文化。¹¹ 尽管有段石锛是经过漫长的岁月在海外逐渐传播开来的，而且在传播过程中又不断发生变异，可是基本造型却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浙江古代海外交流史的基础，是在新石器时代奠定的。

二、发端于汉晋

就整个中国而言，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之际，即公元前 200 年左右。¹² 这一时期中国通往日本的海上航线，沿着山东半岛海岸线向北，再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南下，然后越过对马海峡到达日本列岛的北部。¹³ 虽然由浙江直接通往海外地区的海上航线尚未出现，但在汉代，国外所产的一些玻璃器等物品已经辗转传入了浙江。例如，宁波奉化白杜南岙林场的三座墓葬中发现了 1 件琉璃珠及 2 件玻璃耳珰，其年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¹⁴ 宁波市北仑区大碶街道璁琅村的一座墓葬中发现了一串蓝色玻璃质料珠和一只蓝色玻璃质耳珰，时代是在东汉早期（公元 1 世纪）。¹⁵

东汉后期，发源于印度的佛教也开始传入浙江。史载，汉灵帝末年，中亚安息国僧人安清（字世高）到中国传教（有人猜测他可能经海路先到广州¹⁶）。他在江南活动，最后在会稽（绍兴）去世。会稽人陈慧曾追随安世高，“信道笃密”。¹⁷ 佛教传入后，佛寺也随之出现。东吴赤乌五年（242 年），阚泽把自己在慈湖畔的住宅捐献出来作为佛寺，即后来的普济寺。¹⁸ 吴太元元年（251 年），归安县的刘钺等人也献出房子创建了狮子吼寺。¹⁹ 此外，在这一时期浙江制作的瓷器上，同样可以见到佛像等佛教题材。²⁰ 因此，可以说，汉晋时代浙江已经与海外产生了联系，尽管这种联系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

三、跃升于盛唐

7 世纪，随着新罗的崛起，由中国北方通往朝鲜半岛及日本的传统航路受到了严重冲击。在此背景下，从 7 世纪末开始到 8 世纪，中外航海者探索出了从浙江沿海出发直达日本的海上航线。《新唐书》这样写道：“新罗梗海道，更繇明、越州朝贡。”²¹ 浙江沿海的杭州、明州（宁波）、台州、温州等港口，因此成为通向日本的门户。日本政府派出的遣唐使，实际成行的有 16 次，其中 3 次是在宁波沿海登陆的，分别是 659 年、752 年和 804 年。²² 更加重要的是，进入 9 世纪，民间商人从浙江沿海港口进出，直接与日本进行贸易。例如 842 年，李处人从日本抵达温州；847 年，张友信从明州出发前往日本；877 年，崔铎从台州出发前往日本。²³

在唐代，浙江与东南亚地区虽然没有直接的往来，但间接的联系已经出现了，主要证据就是越窑瓷器的外销。1998 年在印度尼西亚沿海发现的“黑石号”沉船上，打捞出大量的中国瓷器，其中数量最多的是长沙窑瓷器（约 5 万 5 千余件），此外还有越窑青瓷（约 250 件）、白瓷（约 300 件）等。虽然越窑青瓷数量并不多，但器物造型却十分丰富。²⁴ “黑石号”沉船的时代为 9 世纪前期，即唐代中晚期。这说明当时的越窑瓷器已经开始外销到东南亚及更远的地区。在阿拉伯世界已知的 8—10 世纪遗址中，有 69 个遗址出土了中国青瓷，其中绝大部分是越窑青瓷。这些遗址分布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伊拉克的萨迈拉（Samarra）、伊朗的希拉夫（Siraf）、阿曼的苏哈尔（Sohar）、埃及的福斯塔特（Fustat）等。²⁵

四、兴盛于宋元

宋元两朝对海外交往总体上是持开放和鼓励态度的。在此背景下，浙江海外交流史进入了全面繁荣的新高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浙江出现了专门的外贸管理机构——市舶司。在唐朝，只有广州设立了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机构。宋朝先后在 9 个地方设置过市舶机构，分别是：杭州、澈浦、温州、宁波、密州、秀州、江阴军、泉州、广州。²⁶ 其中前四个都设在浙江。元朝正式设立的市舶司有 7 处，分别是：杭州、澈浦、宁波、温州、上海、泉州、广州。²⁷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浙江在宋元海外贸易中，差不多占据了半壁江山。

第二，浙江出现了直达东南亚的海上航线。北宋淳化三年（992 年），闍婆（今印度尼西亚一带）国王派出的使者在中国海商毛旭的引导下，“泛船舶六十日至明州定海县”²⁸，前来中国朝贡。1296 年，温州人周达观随元朝政府派遣的外交使团出使真腊（今柬埔寨），就是从温州港启航的，“历闽、广海外诸州港口，过七洲洋，经交趾洋到占城”，然后继续航行至真腊。1297 年 6 月，周达观返回，“八月十二日抵四明泊岸。”²⁹ 这说明从浙江沿海到东南亚的航线已经比较成熟了。

第三，浙江出现了海外浙江侨民群体。唐末，已经有浙江商人到海外经商，如 819 年，越州人周光翰和言升则搭乘新罗人船只来到日本。³⁰ 不过，他们做完贸易后就回国了，史籍上没有出现过他们在当地居留的记载。进入宋朝，有些浙江人由于种种原因在日本生儿育女。例如南宋时，宁波石匠伊行末被请到日本后成家立业，他的后代继续以石匠为业，并且形成了“日本石刻工艺史上声名显赫的‘伊派’”。³¹ 11 世纪末，在博多出现了宋人居留地。³² 虽然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浙江侨民生活在博多，但至少在 1233 年至 1253 年期间，博多的华人首领谢国明是临安府人，他的墓地一直保存至今。³³

第四，浙江出现了外国侨民的聚居区。随着海外贸易的持续兴盛，许多外国商人不仅在浙江居住下来，而且还逐渐形成了他们自己的聚居区。宁波东门口市舶司附近，有阿拉伯及波斯商人的市场“波斯团”，他们聚居的地方被称为“波斯巷”。³⁴ 元代杭州也有许多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商人，并且形成了自己的聚居区及公共墓地。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写道：“杭州荐桥侧首，有高楼八间，俗谓八间楼，皆富实回回所居……聚景园，回回丛冢在焉。”³⁵ 至今依然保存在杭州凤凰寺的 20 方元代阿拉伯文古墓碑，³⁶ 就是阿拉伯人在此生活的有力证据。

第五，多种外来宗教汇聚浙江。外国侨民来到浙江生活后，自然带来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其中最主要的是伊斯兰教。宋代宁波城内狮子桥北就有一座“回回堂”，元代又在海运所西侧新建了一座。³⁷ 元朝延祐（1314—1320 年）年间，回回大师阿老丁在杭州建造了真教寺。³⁸ 其次是基督教（元代一般称其为“也里可温”）。元代杭州的基督教教堂建造在荐桥东，名为大普兴寺。基督教在元代传入温州后，还因与道教争夺信徒而发生冲突。³⁹ 此外，浙江还有摩尼教的寺院，如宋朝慈溪的崇寿宫⁴⁰，元朝温州的选真寺和潜光院⁴¹。

五、剧变于明清

明朝建立后，一方面实行海禁政策，禁止私人进行海外贸易；另一方面又针对外国人建立起朝贡体制，禁止外国商人到中国来进行民间私人贸易，只允许少数几个被正式承认的海外国家以政治上“朝贡”的名义与中国进行官方往来，并且规定它们只能分别在三个港口进出：“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⁴² 这样，宁波就成了明朝与日本进行官方往来的唯一港口。清朝统一中国后，曾经设立了粤、闽、浙、江四大海关，其中浙海关于 1686 年设在宁波。但从 1757 年开始，清政府放弃了这种“多口通商”的政策，转而实行“广州一口通商”，宁波不再是对外贸易的港口。这个作茧自缚的闭关政策，使浙江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明清两朝政府对海外贸易的刻意打压，不仅严重阻碍了浙江海外交流史的发展，而且还使中国错失了一次迈向世界的大好机遇。

宋元时代，东亚海域基本上是和平的，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暴力事件。但明朝建立后，东亚海域出现了倭寇，而浙江沿海则是倭寇活动最为猖獗的地区。同时，在明朝政府严禁私人海外贸易的背景下，沿海民众为了生计不得不铤而走险，以走私的形式从事海外贸易，并且与倭寇结合在一起，亦盗亦商，冲击着传统的海外贸易。⁴³ 清朝建立稳固的统治后，海盗活动并未消失，1800 年前后还出现了一次高潮。有学者这样写道：“1520—1810 年是中国海盗的黄金时代，中国海盗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范围上，一度都达到了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的海盗均无以匹敌的地步。”⁴⁴ 明清时期的浙江海外交流史，就是伴随着海盗活动而艰难展开的。

特别重要的是，进入 1500 年之后，由欧洲人掀起的全球化浪潮日益猛烈地冲击着中国沿海，而浙江则是最早受到全球化浪潮冲击的区域。约 1524—1548 年，葡萄牙人在宁波沿海的双屿建立起了欧洲人在东亚的第一个贸易据点，浙江开始被纳入全球海上贸易网络中。通过这个网络，不仅中国的商品被输往欧洲，而且浙江沿海的一些居民也漂泊到了欧洲。⁴⁵ 17 世纪后期，从宁波出发的商船直接航行到西班牙统治下的菲律宾。⁴⁶ 17 世纪末，英国人来到舟山进行贸易。⁴⁷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欧洲文化也开始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浙江学者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过程中，一直走在前列。明清之际，杭州还是中西文化交汇的学术研究中心，并且通过与西方学术界的密切互动，在中国古代景教研究等领域引领着国际学术的前沿发展。⁴⁸

值得一提的是，从 16 世纪开始，在浙江发生的一些事件还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个典型例子是，葡萄牙人自

15 世纪末开始海外扩张以来，所遇到的对手或者是落后的非洲部落，或者是分裂之中的印度，或者是羸弱的东南亚小国，因此在大西洋进入太平洋的整个过程中，都是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葡萄牙人到了中国沿海后，起初也想凭借先进的船舶及武器，以武力强行占取落脚点。但他们在浙江沿海建立的第一个贸易基地双屿港于 1548 年被明朝军队彻底捣毁，这使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前所未遇的强国。葡萄牙人不得不调整策略，逐渐放弃海盗式的暴力强占方式，转而以谦卑恭顺的姿态，向明朝政府宣称自己是因为向往中华文明而前来朝贡的，与此同时，通过各种手段向明朝官员行贿。另一方面，明朝政府在以武力驱赶葡萄牙人的过程中也逐渐认识到，这是一批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型“蛮夷”，他们不仅拥有先进的武器，而且还精于经商，因此不能照搬历代治理其他“蛮夷”的传统方法来对付葡萄牙人。这样，明朝政府也调整了一味清剿的做法，转而采用怀柔的策略。由于中葡双方都调整了策略，明朝政府最终同意葡萄牙人在交纳关税及地租的前提下入居澳门，葡萄牙人则在接受中国政府管辖的前提下实行自治。从此，澳门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汇的枢纽。因此，双屿是澳门历史的序曲，双屿的覆灭与澳门的出现存在着内在的联系。⁴⁹

另一个影响更大的实例是，从 17 世纪末开始，英国商人多次到舟山来进行贸易，并且受到了浙江官员及民众的欢迎。乾隆皇帝虽然清楚地知道，英国人所需要的丝绸、茶叶等货物主要产于江浙地区，如果允许英国人在舟山进行贸易，既可以节省英国人的商业成本，又可以促进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但他出于对国家海防安全的担忧，最后还是于 1757 年宣布禁止英国商人前往舟山贸易。从此，清政府的外贸政策就从“多口通商”转为广州“一口通商”。而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则“对中国的一口通商制度展开了一波又一波的、越来越猛烈的冲击，以图实现在中国各口岸‘自由’通商的目的”⁵⁰，最终结果就是 1840 年爆发的鸦片战争。

总之，从明朝建立到 1840 年前，浙江的海外交流活动一直受制于相互对抗的正反两股力量：反的力量主要是朝廷的残酷打压，以及倭寇海盗的野蛮冲击；正的力量主要是民间海外贸易的冲动，以及 1500 年之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与活力。这两股力量相互撞击，使浙江海外交流史充满了剧烈的动荡，并且在动荡中催生出前所未有的巨变，而这样的巨变又酝酿出更加剧烈的动荡。400 多年的浙江海外交流，就是在这样的激变中曲折发展的，同时也为进入下一个历史阶段积蓄能量。

六、转型于近代

1840 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放弃“广州一口通商”政策，转而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港口城市。1877 年，温州成为对外开放城市。1896 年，杭州开埠。以这三个对外开放城市为龙头，浙江海外交流史逐步从传统向近代转型，其内容包括：从传统的木帆船向轮船过渡；传统的海外交流是以农业手工业为经济基础的，而近代海外交流则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基础之上的；西方文化全面地、大规模地输入，包括学校和医院、电话和电报、报纸和杂志、灯塔和码头、马路和铁路、西服和西餐、肥皂和火柴、煤油灯和热水瓶等。

在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过程中，浙江海外交流在不少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例如，1844 年，英国女子马利（Mary Ann Aldersey）在宁波创办了中国内地最早的女子学校。511845—1860 年在宁波设立的华花圣经书房，不仅是当时中国“唯一拥有”四种中文活字的出版印刷机构，而且运用先进的电镀技术制造出了中文活字，从而为“西式中文活字逐渐取代木刻”奠定了基础，“在近代中文印刷发展史上有非常重大的意义”。521851 年，美国人玛高温（Daniel J. Macgowan）在宁波出版了最早介绍电磁学及电报知识的中文著作《博物通书》，书中还提出了世界上第一套汉字电码方案。531854 年玛高温在宁波创办的《中外新报》，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创办的第二种报刊，晚于 1853 年在香港创办的《遐迩贯珍》，早于 1857 年在上海创办的《六合丛谈》。541855 年，宁波商人购得“宝顺号”轮船，这也是近代中国引进的第一艘轮船。55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鸦片战争前，宁波港在对外交流中的地位要高于上海港，因为宁波是“国际贸易网络和国内贸易网络的重要节点”，而作为国内最大内贸港的上海，“其直接和外洋的贸易联系并不发达”。鸦片战争后，上海港迅速“跃居中国各大港口的首位”，“成为远东地区的枢纽港之一”，宁波则衰退为上海的支线港。⁵⁶ 尽管浙江最大的港口没落了，但浙江人却抓住了上海崛起的机遇，在上海开埠之初就背井离乡参与上海建设，“并且几乎在所有重要行业都具有重要影响，在不少行

业稳执牛耳”。571852年，在上海的宁波人就达6万多人，“仅次于广东人”，到了19世纪50年代后期又超过广东人，“成为上海外来居民中最大的移民集团”。⁵⁸这样，大量浙江人就借助上海这个国际枢纽城市，从事与海外交流有关的活动，如充当买办的宁波人杨坊、余姚人王槐山、定海人朱葆三、湖州人顾福昌和许春荣等。这些浙江人，还在上海从事文化教育活动，如慈溪人叶澄衷创办了“澄衷蒙学堂”，鄞县人鲍咸昌创办了商务印书馆。而居住在上海的浙江人，又通过地缘及亲缘纽带与故乡保持密切、频繁的联系。这样，浙江的海外交流活动就延伸到上海这个国际大舞台，并将从上海吸收到的文化养料源源不断地回输到浙江。浙江的海外交流活动因此而变得在形式上更加多样，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在影响上更加深远。

结语

自先秦至隋唐，在中国海外交流史的巨大历史图景中，浙江从边缘逐渐走向前沿。到了北宋，宁波港已经成为整个东亚海域的国际交流枢纽。进入16世纪，随着全球化的兴起，浙江沿海港口又被纳入环球航线中，从而成为全球海上贸易网络的一个重要节点，浙江沿海在东亚海域的枢纽地位因此而得到进一步强化。野心勃勃的日本军阀丰臣秀吉（1536—1598年）就曾梦想，一旦他以武力征服中国、朝鲜半岛之后，就将日本天皇安置在北京，而他自己则到宁波城定居，以控制整个东亚海域。⁵⁹不过，16世纪以来，浙江一直是以被动的方式消极而又艰难地应对着全球化浪潮的一次次冲击，浙江海外交流史的历程也因此充满了曲折和灾难。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不仅以无比磅礴的气魄勇敢地直面新型全球化的猛烈挑战，而且还通过脚踏实地的拼搏，主动积极地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并且借助科技创新的巨大力量影响着全球化的进程。宁波舟山港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港，货物吞吐量连续十多年位居全球第一。今天，当我们在国外偏远小超市里也能使用支付宝时，当我们在世界角落里也能找到来自义乌的小商品时，当我们在全球各地都能发现来自浙江的游客时，当我们在异域各类高校中都能看到来自浙江的青年学子时，再回头看看古代浙江海外交流史，我们会由衷地感受到，只有改革开放才能使浙江不断繁荣富强，才能使中华民族实现腾飞。

当前，浙江正致力于中国现代化先行区建设。在此背景下，深入探讨古代浙江海外交流史历程，不仅可以增强自信，而且还可以总结经验并汲取教训，从而确保现代化伟业的顺利开展。

注释

1 童杰、龚纓晏：《井头山遗址在世界史前史研究中的意义》，《浙江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

2 孙国平、王永磊：《从井头山遗址看宁波地理环境与海洋文化的关系》，《宁波通讯》2020年第18期。

3 相关研究可参见 Ronald Bockius et al., Early Watercraft: A Global Perspective of Invention and Development, Vrhnika: Global Initiative, 2015.

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42~50页。

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页。

6 林士民：《宁波沿海地区原始文化初探》，《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

7 李安军：《田螺山遗址——河姆渡文化新视窗》，西泠印社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页。

8 参见毛昭晰《浙江支石墓的形制与朝鲜半岛支石墓的比较》，载《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版，第6~15页；《先秦时代中国江南和朝鲜半岛海上交通初探》，《东方博物》第十辑，2004年第1期。

-
- 9 安志敏：《长江下游史前文化对海东的影响》，《考古》1985年第5期。
- 10 蔡凤书：《中日交流的考古研究》，齐鲁书社1999年版，第19页。
- 11 参见林惠祥《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锛》，《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傅宪国《论有段石锛和有肩石器》，《考古学报》1988年第1期。
- 12 李庆新：《濒海之地：南海贸易与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页。
- 13 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修订版）》，海洋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126页。
- 1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奉化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奉化白杜南岙林场汉六朝墓葬》，载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汉六朝墓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4~337页。
- 15 浙江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宁波北仑区博物馆：《浙江宁波北仑大碇璆琅东汉墓葬与五代窑址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14年第3期。
- 16 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页。
- 17 释慧皎：《高僧传》，汤彤校注，汤一玄整理，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7页。
- 18 《延祐四明志》卷十八，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392页。
- 19 《嘉泰吴兴志》卷十三，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751页。
- 20 参见林士民《青瓷与越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8~70页；蒋明明《佛教与六朝越窑青瓷片论》，《东南文化》1992年第1期；阮平尔《浙江省博物馆藏隋以前文物的佛教因素研究》，《东南文化》1992年第5期。
- 21 《新唐书》卷二二〇，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209页。
- 22 李广志：《日本遣唐使宁波航线考论》，《南开日本研究（2016）》，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 23 吴玲：《九世纪唐日贸易中的东亚商人群》，《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 24 陈克伦：《印尼“黑石号”沉船及其文物综合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9年第4期。
- 25 Wen Wen,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Islamic World from the 8th to 10th Centuries CE, A Thesis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Oxford, 2018, p. 54, p. 154, p. 106, p. 205, p. 210.
- 26 郑有国：《中国市舶制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
- 27 喻常森：《元代海外贸易》，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6页。

-
- 28 《宋史》卷四八九，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14092 页。
- 29 周达观：《真腊风土记》，夏鼐校注，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15~16 页。
- 30 吴玲：《九世纪唐日贸易中的东亚商人群》，《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3 期。
- 31 刘恒武：《宁波古代对外文化交流——以历史遗存为中心》，海洋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45 页。
- 32 裴岚：《关于博多居留宋人》，载李世安主编《史学论丛》，中国书店 1999 年版。
- 33 李广志：《南宋海商谢国明与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8 年第 6 期。
- 34 《乾隆鄞县志》卷二，第 16 页，宁波天一阁博物院藏。
- 35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348 页。
- 36 参见莫尔顿（A. H. Morton）等《杭州凤凰寺藏阿拉伯文、波斯文碑铭释读译注》，中华书局 2015 年版。
- 37 《至正四明续志》卷十，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6571 页。
- 38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09 页。
- 39 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7~28、42~43 页。
- 40 陆永生：《崇寿宫与黄震〈崇寿宫记〉》，载政协浙江省慈溪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慈溪文史资料（第 11 辑）》，1996 年，第 149~153 页。
- 41 马小鹤：《民国〈平阳县志〉摩尼教资料新考》，《绍兴文理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21 年第 9 期。
- 42 《明史》卷八一，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980 页。
- 43 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0~50 页。
- 44 安乐博：《中国海盗的黄金时代：1520-1810》，《东南学术》2002 年第 1 期。
- 45 龚缨晏、胡刚：《16 世纪发生在西班牙的一场“印第安斯人”诉讼案》，《世界历史》2017 年第 5 期。
- 46 胡安·希尔：《马尼拉的华人（16-17 世纪）》，安大力译，澳门：文化公所，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 2022 年版，下卷，第 266、270 页。
- 47 林金水在《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37 页）中说：“1685 年，利班纳（Win Cheslaus Libanus）在厦门、舟山一带采集”植物标本，并将其寄回英国。这一说法，被其他学者所引用。其实，此处“利班纳”的原名是 Wincheslaus Libanus，但他采集标本的地点是厦门，而不是舟山。参见 J. E. Dandy, The Sloane Herbarium, London: British Museum, 1958, p. 157。

到舟山采集标本的英国植物学家是坎宁汉姆 (James Cuninghame)，时间是在 1700 年至 1702 年，参见 C. E. Jarvis, P. H. Oswald, “The Collecting Activities of James Cuninghame FRS on the Voyage of Tuscan to China (Amoy) between 1697 and 1699,” Notes and Records, No. 69, 2015, pp. 135~153.

48 龚缨晏：《欧洲与杭州：相识之路》，杭州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49~150 页。

49 吴志良、金国平、汤开建：《澳门史新编》第 1 册，澳门基金会 2008 年版，第 70~74 页。

50 郭小东：《打开“自由”通商之路——19 世纪 30 年代在华西人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探究》，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79 页。

51 龚缨晏、郑乐静：《来自英国的马利姑娘：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开创者》，《社会科学战线》2017 年第 3 期。

52 苏精：《铸以代刻——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2014 年版，第 387、439 页。

53 龚缨晏、郑乐静：《为中国设计电码：美国传教士玛高温的〈博物通书〉》，《自然辩证法通讯》2018 年第 6 期。

54 龚缨晏：《浙江早期基督教史》，杭州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23 页。

55 龚缨晏：《中国第一艘轮船的由来》，《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2 期。

56 王列辉：《驶向枢纽港：上海、宁波两港空间关系研究（1843-1941）》，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9、62、70、375 页。

57 陶水木：《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1840-1936）》，上海三联书店 2000 年版，第 37 页。

58 李斌：《上海的宁波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2 页。

59 郑樵生：《明史日本传正补》，文史哲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732~733 页。